

文人的“理想国”

——评余三定《南湖藏书楼纪事》兼论藏书的哲学

刘芳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余三定先生的南湖藏书楼是对传统藏书楼的继承和发展,它不只是文人的精神寄托,亦是文人的理想国;其《南湖藏书楼纪事》一书蕴含的藏书思想,对当下时代精神的建构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余三定;南湖藏书楼;《南湖藏书楼纪事》;文人理想国;藏书楼思想

[中图分类号]G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6)04-0122-03

“Utopia” of Literati

——Review on Yu Sanding's *Chronicle of South Lake Library*

LIU Fa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e south lake library of professor Yu Sanding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library. It is not only the spiritual bailment of literati, but also the utopia of literati. The thoughts on book collection in the *Chronicle of South Lake Library* has special value and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ime spirit.

Key words: Yu Sanding, south lake library, *chronicle of south lake library*, utopia on literati, thoughts on book collection

藏书楼,一个仿佛历史的遗留物,似乎要被图书馆甚至电子媒介这样不同空间所取代,可是,正是这样一个传承文明的场域充满了东方灵韵。中华文化的传播与藏书楼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藏书楼也是一条走进中国传统文化的通道。甚至可以说,没有藏书楼就没有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历史的变迁总会留下空间的烙印。图书馆是西学进入中国的空间标志,电子媒介通向未来的空间标志,而藏书楼则连接着过去。“南湖藏书楼”和中国传统历史当中遗留下来的图书馆不一样,“南湖藏书楼”今韵与古韵虽不相同,但古韵、今韵却能在这里交汇。读《南湖藏书楼纪事》(余三定等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在藏书楼中可观天地,可听风雨。如此佳境,正是文人的“理想国”。

一 “理想国”的哲学内涵

柏拉图认为在理想国中“正义”指的“不是关于外在的‘各做各的事’,而是关于内在的,即关于真正本身,真正本身的事情。这就是说,正义的人不许可自己灵魂里的各个部分相互干涉,起别的作用。”^{[1]205-492}柏拉图把人的心灵比做音乐,心灵的和谐就“仿佛将高音、低音、中音以及其间的各音阶合在一起加以协调那样”^{[1]205-492}。同样,《乐记》中提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到,音乐就是文。而且,柏拉图借苏格拉底指出“就词而论,我想唱的词和说的词没有分别,必须符合我们所讲过的那种内容和形式。”在古希腊,一首完

收稿日期:2016-06-03

作者简介:刘芳(1985-),女,山西朔州人,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

整的诗歌,包括诗词、节奏和和声。所谓正义的靈魂,就是它各个部分充分地发挥了其相应的作用,并不逾越,就好像音乐一样的和谐。柏拉图认为音乐作用于人的心灵,使所有这些部分由各自分立而变成一个有节制的和和谐的整体。中国文人同样讲求内在的和谐,进一步讲是外在的和谐,天人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且应当安排好真正自己的事情,首先达到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的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孔子在《论语》中提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远,不可以常处乐。仁者安仁,智者利仁。”(《论语·里仁》)柏拉图将人的心灵比作音乐,正义便是人进入一种和谐的状态,如音乐一样按照节奏、韵律、音阶的不同和谐地成为一个整体。“他都相信并称呼凡保持和符合这些和谐状态的行为是正义的好的行为,指导这种和谐状态的知识是智慧,而把只是起破坏这种状态作用的行为称作不正义的行为。”^{[1]205-492}而《乐记》中则提到“乐者,天地之和也”,所以,对于中国文人而言,欲获得内在的和谐就意味自身内在秩序的和谐,这其中就孕育着中国文人慎独的思想,而中国文人独处多与书为伴。另外,中国文人十分重视读书的环境,昔孟母三迁,就是意识到空间环境会影响人读书习惯的养成。

柏拉图反对模仿,但认为“如果要模仿的话,应该从小起模仿与他们专业有正当关系的人物——模仿那些勇敢、节制、虔诚、自由的一类人物。凡与自由人的标准不符合的事情,就不应该去参与或巧于模仿。”^{[1]120-492}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充分强调“征圣”的重要性,所以,对于读书而言,无论是读书的内容还是读书的空间环境,都需要谨慎对待,良好的读书空间环境对人读书习惯的培养无疑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藏书楼所营造出的读书氛围和对书的尊崇自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书人。

从精神的层面来讲,建构东西方“理想国”有相同又有许多不同,首先,柏拉图理想国的核心是“理念”,中国文人理想国的核心则是“文”。“理念”是抽象的,“文”却是具体的。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对现实社会图景的改造,而文人则在现实图景之外另绘了一幅关于心灵的图景,这就是“文”的世界,而“书”是承载“文”实体。当“文”进入“书”,“文”的面貌就发生了巨大改变。从“口”到“书”,这种书写媒介的转化标志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转换。在口传时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最为亲近,人与人的交流和沟通是当下的,面对面的。

进入到书写媒介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向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伦理关系转变;进入电子媒介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疏远了,人与人的之间关系又开始转化为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机器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所使用的“物器”的发展史,这些“物器”作为人类衍生物,是人存在的表征。当人开始使用工具的时候,便与动物区别了开来,也就是说,人与动物真正的区别在于人“善假于物”,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到“不论谈到什么事物都有三种技术:使用者的技术、制造者的技术和模仿者的技术。”当其进入实用层,即日常生活视阈中时,便可称为技术;当其进入人欣赏的视阈中时,便是艺术,因此,可以说“艺术”是谓“技术”之精粹。“文”天地之心,当“文”进入人“心”,最初人所寻求的表达的媒介正是人自身,无论是通过“口”还是“手”,都是“文”的表达,“心”的表达。其实,所谓“天文”,是天的运动和变化,所谓“人文”,是人心的运动和变化。以“口”和“手”为媒介通过文字来表达是为“文”也,“文”之精粹为“诗”,以声为媒介通过“口”来诵唱的为技、为艺,其形式为歌,以“身”为媒介通过“肢体”来表达的为技、为艺,其表达形式为“舞蹈”,以“线条、色彩”作为媒介通过“手”来描绘同为艺,其形式为绘画,传统的“文、艺”都借助人的肢体来表达,“文、艺”都是心的表达,而“技”则是对形的模仿。不过,“文”通过“字、语言”是对“心”一种表达。“字”的形成过程是万事万物秩序化的过程,为“文”的过程正是用心驭字的过程,当“文”发展为“书”,“书”成为人独语的开始,“书”反过来又成了人孤独中的伴侣,“文”是“书”的空间承载,藏书楼又是“书”的空间承载。因此,“有书”,有“读书”,进而有“藏书”。但是,现代社会,人们不藏书也可以读书,为什么还有人乐此不疲地藏书呢。

二 藏书楼的现代哲学

藏书,重视的是书所营造的氛围和空间感受。藏书可调动人多方面的身体感官,书香调动人的味觉,通过味觉刺激人的大脑,书进入了人的眼睛,直接刺激人的视觉,而人在书的环境中更是能够感受到一种书的氛围直接带人进入到人无意识的层面。广告正是利用了人的这种无意识接受的心理学图式,藏书也正是为了建构一种场域,促人读书的场域。藏书的核心是场域的建构,余三定先生修建南湖藏书楼正是这样场域的建构。

当代文学应该注重文学媒介的存在,“在现代传媒强势接入社会生活和文学活动的今天,忽视媒介要素存在的四要素范式已经暴露出了不能充分解释文学活动事实的理论局限。”^[2]笔者则认为,除了注重文学的媒介存在,更要注重文学的场域存在之维。关于书的哲学,一直以来,都是以“文”作为哲学本体的,并建构了“以文为中心”的本体论哲学。中国最早的书籍当中,许多作者的名字并不出现,《吕氏春秋》中许多作者的名字都被隐去,而为人们所熟知的是编书者的姓名,《诗经》里许多诗歌的作者同样佚名。最初,文学是以口传的形式存在的,流传过程中,作者的名字慢慢被人遗忘,只留下了作品。先古之人并没有版权意识,文的作用在于抒发感情、交流情感,在流传过程中,人人都是作家,因此作家被忽略了。随着书写工具的发明,“文”进入到了“书”的世界当中,从此,“书”便成了“文”,“文”便是“书”,“书”和“文”的合一。“天地人”三才合一,由此来看,“人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文化”的过程,“文”是人观天地、感悟天地的过程,“文”是天地间的精神。“书”或龟甲金石刻之,或丝绢造之、或竹木为之,均天地有形之造也。“文”和“书”的合一是“天地人”的合一。同时,“文”和“书”的结合,意味人类历史的开始。历史是通往过去的记忆,但是,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没有记录就没有历史”,没有龟甲、壁画、器物、书籍等的留存,就难免历史的踪迹。有了这些器物,便留存了基本的历史客观性,但这些,又是历史本身的沧海一粟,余下的都留给了想象。总之,“文”和“书”结合,文学开始具有了史的意味,同时,文也具有了物理的存在方式——书。有书,就需要书的物理存在空间,这也欲求着藏书楼的诞生。

当进入“书”为本体的阶段后,人从与“天地”同游的世界中,进入了“人”的世界当中,这是在“文”实体化为“书”过程中完成的。当人开始读书的时候,人就进入个体玄思的空间当中了,读书观道,需要“涤除玄鉴”“澄怀味象”,读书人开始了自我修炼,于是,读书人“自律”的时代开始了,所谓文人理想人格范式就是文人自律的结果,文人渐渐地开始爱书如命,文人不苟于世的人生态度大抵因为文人比一般人而言,多了另一个世界,那就是文人独有的理想国,一个可供文人“独善其身”的世界。不过,中国文人最渴望的是“兼济天下”,如能在现实世界中有所作为,便是文人理想和价值最高的实现。

在第三个层面的理想国当中,所谓以文为心的现实世界,指的是一个读书的世界,一个实践“文”和“书”的世界,也就是现实世界“文化”的过程。“以文化之”使现实世界变得更美好,这是文人的理想。余三定先生在他《我的快乐读书观》中指出,现代社会,大学生接受教育并不等于“读书”。接受教育是一种被动的行为,所读课本乃通识读物,像这样的书,意在传授知识,是知识上的扫盲,只能算文人意义上“识字”的阶段。“教育”和“读书”多有重叠之处,而且在受教育的时间内“读书”是最便利的。但是,二者还是有差别的,教育意在塑造人,意在使学生合乎社会既有之规范,这是现代人读书受教育的基础。但是,“读书”却是让人发现自身。因此,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些人虽然并没有接受高校教育,但却在社会中获得了成功,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也不乏庸人。

余三定先生藏书的哲学正是建立在“读书”哲学基础之上的。“读”,将本体转向了“读书的人”,不再以“书”作为本体,也是现代读书哲学和传统读书哲学的不同,口传时代的文学以“文”为主,进入传统社会则以“书”为主,而进入现代社会,则转向了“读”。首先,不同的人读同一本书,感受体悟各不相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空间来读,感受体悟也不相同。而且,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和图书馆业的发达,获得书的渠道相对古人更加便利了,对于个体来说,“读还是不读”,“是读还是看”,“是读还是听”,摆在现代人面前的选择实在太多了。因此,“读”“读什么”“用什么方式来读”这些对于现代人来说都是问题。最后,读书哲学是如何如何进入到藏书哲学的呢。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现代社会,人们读书的渠道变得多样,电子媒介大有取代纸媒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藏书”更多了后现代的语境。现代人藏书和古人藏书也变得不同。

湖湘文化渊源流长,秦汉便已闻名,宋代随着书院的兴盛,湖湘文化蔚为大观,这其中书院的发展为湖湘人带来了文化上的自信。历史上,湖南围绕书院展开的藏书、读书活动不胜枚举。中国历史上,书籍命运之多舛令人咋舌,早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后有乾隆年间修撰四库全书大刀阔斧的删减,因此,书籍的保存是难的,为了保护书籍,古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每一本书传承下来,都是令人心中生敬的。对于今人而言,各种各样的纸媒文本都有电子文本,书籍这种数字化的存在方式给

人巨大的便利。还有各种阅读器的发明似乎开始宣示纸媒在未来可能走出人们的生活,那么,书还要不要藏,民间藏书的意义又在哪里?难道仅仅是一种爱好。民间藏书,先不论所藏之书的价值,就藏书本事来看,民间藏书,是对书籍最深的敬意。另外,民间藏书还是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的体现,无论古人还是现代人藏书都更看重书籍的实用功能,但是若仅仅论及对书籍的使用,自然不必藏那么多的书,那么多的书也势必是看不完的,因此,藏书一事,在功能之外,古人之趣、今人之趣不同,古人藏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存和传承。对于现代人而言,藏书的语境发生了变化,藏书的作用和意义也自然发生了转化,对今人而言,藏书于社会是氛围的营造,于个人如隐终南之山,同时,又如增加了一条通过藏书楼回望古人的时空隧道。

三 文人的理想

何为“文人”?从文字形义学的角度来说,“文”同“纹”,在《文心雕龙》中便以器物之“纹”为“文”。《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中提到“经纬天地曰文”。《文心雕龙》中又进一步指出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最初的“文”指的是天地之心。朱熹说“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谓文王。”(朱熹《诗集传·卷十八》)这里的“文人”是以君王为代表的政治领袖,文指的就是礼乐制度。从文化的角度来讲,文人指的有文德的人。后来,“文人”指的是“士人群体”,“士人”是沟通王和道的人。发展到魏晋时期,“文人”的含义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文人”指的是:“辞赋之士”“文章之人”。文采即“采掇成书,以上书奏记者”,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文人”就是“辞人”。发展到近代,文人主要指的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大约出现在19世纪,是近现代才传入中国的西方概念,而知识分子主要是指能够融会批判意识或以道义情感而连结起来的集体想象共同体。作为文人往往“对思想、对感情、对社会人生的体会和领悟比一般人更敏锐,追求更执着”。^[3]总之,可以说,在中国“文人”是可为天地立心、立功、立言、立德的人。当然,历史上亦不乏对文人的贬斥,这主要是因为文人渐渐失去了“士大夫”实践的品格。

最后,在现代化的语境下,“文人”“知识分子”应该具有怎样的使命?知识分子为社会立法的时代已然过去,“文人”“知识分子”从日常生活方式

的层面为大众提供更好生活方式作为一种参照,并通过思想、语言和行动激发大众对更健康生活方式的想象,应当是当代文人的责任。当代社会人受“物”的支配严重威胁到了人的存在。藏书却是一种诗意的栖居方式。藏书,在今日还意味着是对消费化生活方式的变革。另外,藏书之所也是以文会友绝佳的场所,可以说“以酒会友不如以茶会友,以茶会友不如以书会友”,余三定先生以书会友,以书聚友,南湖藏书楼不但有知名学者来访,也有后学青年来藏书楼参观、学习和交流,藏书楼每年都会和北大《研究生学志》联合举办学术交流活动。从现实的层面来讲,余先生的藏书楼具有:藏书、读书、谈书和研讨的多重功用。^[4]从影响的层面来讲,藏书,匡社会风气,正民众德行,是引导重塑社会价值观的实践活动,亦当代雅士所为也。

余三定先生藏书楼建成已有17年,余先生逐步形成了自己关于藏书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和实践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转化为哲学,其中,余先生在他的那篇《我们的思维认识存在严重问题》一文中指出,读书和行动二者不能截然区别一个先后,二者是并行的。同时,他还强调对不同思维阶段的人应该说不同的话,话语要依据语言背景(场合、接受者)来讲才是合适的。余先生早年便是学习西方哲学的,但在其文字中,充溢着一种浓烈的湖湘文人重视传统、重视文化的哲学气息,强调“经世致用”的精神。余三定先生早年更多的将精力投注到文墨典籍的搜藏和藏书楼建设方面的实践工作。现如今,恰逢余三定先生卸任公职之际,将余三定先生的藏书思想、教育观念和办学实践略作总结,或许有益于当下时代精神之建设、文化传统之保留和藏书品格之弘扬了。

参考文献:

- [1] 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2] 单晓曦.媒介与文学:媒介文艺学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46.
- [3] 张海鸥.中华雅风民俗丛书:两宋雅韵[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6.
- [4] 余三定.南湖藏书楼的主要功用[J].武陵学刊,2015(1):135.

责任编辑:黄声波